专题一：生死存亡的民族危机

鸦片战争及此后的变局，使中国的有识之士产生极大刺激，并普遍感到：西洋大小各邦，越海道数万里，闯入中国边界腹地，集聚于中国，以广运万里、地球中第一大国而受制于外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从1840年始，中华民族如何在强国如林的近代世界中“自立于天下”，而不为“天下万国所鱼肉”的问题，切实地摆在中国人民的面前。通过本专题学习，帮助学生深刻、明晰地了解近代中国深巨创痛下生死存亡的民族劫难和危机。

一、教学目标与内容分析

（一）教学目标

1、认识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及双重使命；

2、理解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及革命任务；

3、了解近代中国民族意识觉醒的历程和表现。

（二）专题内容结构

**1、专题与教材的关系**

本专题依据2018版教材上编综述“风云变幻的八十年”、第一章“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所设计。

**2、专题设计思路**

本专题从近代以来资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本质、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改变、巨大压力下中国人民民族意识的觉醒三个方面来设计教学内容，在辩证的分析鸦片战争所带来巨大冲击的基础上，对近代中华民族所面临的生死存亡危机有一个明晰、深刻地了解，认识到“落后就要挨打”，只有发展壮大才是国家、民族发展之根本。

**3、专题知识结构**

（三）教学重点和难点

**1、教学重点**

（1）近代中国民族意识觉醒的历程及表现

（2）近代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

**2、教学难点**

（1）资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本质

（2）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

二、教学过程

（一）导入设计

自2017年8月始，有关“精日”及诸多的精日事件被反复提及，并屡见报端，“精日”这个群体也逐渐被大众所了解，尤其是2018年9月间厦门大学的“洁洁良”事件更是一度引爆舆论。精日者不可思议的是非观和歪曲的历史价值观，恰恰反映出当下青年人，特别是一些青年学生思想上对近代历史认知的偏差，这也正是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殖民侵略有功”错误言论的变异、极端化再现。如何看待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是学习《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首要的问题。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教学实践过程中，大学生最容易感到困惑和疑问较多的问题也多集中于此：鸦片战争前，香港仅是一个荒凉的小渔村，被英国占领后，逐渐发展成为繁华的国际大都市，是不是英国占领的功劳？上海等口岸虽然是西方列强强迫清政府开放的，但开埠后却成了繁荣的港口，相对内地其他地方更繁荣富裕，是不是我们就不该反侵略？如何看待这样的问题？对于学生认识上的疑惑和混乱，不能简单化的给予回答，而应该将理论和历史事实相结合，进行全面、辩证的阐述和深入、具体的剖析。

（二）要点解析

**1、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

近代中国受到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这是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也是决定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重要依据，更是近代中国社会落后贫困的根本原因。

有人曾说：“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近代文明”，也有人说：“殖民主义在世界范围推动了现代化进程”，还有人说：“没有西方的殖民侵略，东方将永远沉沦”。有人甚至还以马克思论述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和殖民主义具有“双重使命”的提法，作为自己的理论根据。

那么，如何用理论与历史统一的方法去看待这个历史、现实问题？怎样辩证的理解马克思关于殖民主义具有“双重使命”的论断呢？

（1）关于殖民主义的历史

首先回顾一下殖民主义的历史。15 世纪，西方冒险家远渡重洋的环球旅行和随之而来的征服、掠夺，揭开了近代殖民扩张的序幕，宣告了殖民主义的产生。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殖民主义者主要是通过海盗式的土地、财物掠夺、欺诈性的贸易和奴隶贩卖等方式，从美洲、非洲、亚洲、大洋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攫取巨额财富。据不完全统计，从1502到1660年，西班牙从美洲劫掠走18600吨注册白银和200吨注册黄金，到16世纪末，世界黄金总产量中有83%被西班牙所占有。与欧洲人的扩张相伴随的，却是美洲两大文明中心的悲歌，到1570年，战争屠杀和奴隶贩卖，使墨西哥地区的人口从2500万下降到265万，秘鲁的人口由900万下降到了130万，美洲大陆的原住民印第安人更是急剧减少了90%。

1840年当英国首先实现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后，资产阶级要求更广阔的国外市场和原料供应地，推动了西方列强向世界更大规模的急剧扩张。殖民主义者运用各种手段，对南北美洲、非洲和亚洲的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侵略，使它们在不同程度上沦为列强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成为其垄断的商品倾销市场、原料供应基地和投资场所。而在19世纪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后，资本输出成为殖民剥削的重要形式，瓜分世界的狂潮出现，殖民主义进一步发展成为一个由少数帝国主义强国主宰世界的更完整的体系。只占世界人口2%的英国，所生产的工业品占到世界工业总产量的45%，并占有世界商船舰队数量的1/3，拥有世界出口总额的1/4和进口总额的1/3，成为世界资本主义最强大的国家。在亚洲，英国占领印度，入侵阿富汗、新加坡和缅甸等国家和地区后，对中国发动了蓄谋已久的武装侵略。通过一系列的侵华战争，仅晚清时期，中国政府的战争赔款就高达13亿两之巨；通过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中国被纳入了欧美资本主义的世界条约体系。英国等西方列强在中国攫取了大量侵略特权。如：割占香港，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外国船舰可在中国领海航行，破坏了中国的领海主权；外国人在华不受中国法律管束，享受领事裁判权，破坏了中国的司法主权；协定关税，则破坏了中国的关税主权；等等。

由此可见，殖民主义的历史就是一部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血与火的历史”。

（2）关于“双重使命”

再来阅读一下所谓殖民主义具有“双重使命”者的理论依据，有关马克思论述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和殖民主义具有“双重使命”的提法，领会其精神和内涵。

**链接·文献：马克思“双重使命”论述[[1]](#footnote-1)**

的确，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被极卑鄙的利益驱使的，在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上也很愚钝。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末，英国不管是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

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

英国资产阶级看来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给人民群众带来自由，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都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但是，为这两个任务创造物质前提则是英国资产阶级一定要做的事情。难道资产阶级做过更多的事情吗？难道它不使个人和整个民族遭受流血与污秽、穷困与屈辱就达到过什么进步吗？ ----《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

如何理解马克思关于殖民主义“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以及殖民主义的“双重使命”论述？如果就此认为马克思是在赞颂殖民侵略，必定是偏颇的。为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克思的原意，则结合中国近代历史从三个角度对此进行辩证的分析。

第一，从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关系的角度理解。英国侵略印度的目的是把印度变成其殖民地，而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和资本－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主观动机也是要掠夺、压迫中国，企图把中国变成其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这完全是由他们“极卑鄙的利益所驱使的”，而决不是为了给中国带来“近代文明”，帮助中国变成独立富强的现代化国家。但同时，也应该承认它在实现其利益和目的的过程中不得不带来的客观效果，如瓦解中国的封建自然经济，把中国卷入世界市场和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传播了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物质文明，并客观上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中国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新型知识分子的产生创造了物质前提。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殖民主义“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并具有破坏性和建设性的“双重使命”。

第二，从正义和非正义、是非善恶的道德判断角度理解。英国发动鸦片战争以及资本－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是非正义的。它们向中国走私毒品鸦片，贩卖人口，发动战争，运用各种手段掠夺、屠杀、压迫、剥削中国人民，这些都是极其野蛮的、可耻的、不道德的罪行。马克思在著作中愤怒揭露和谴责了殖民主义的这些侵略罪行。因此，决不能因其有“双重使命”的客观效果而替资本－帝国主义侵略辩护、美化甚至评功摆好。

第三、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角度理解。即使殖民主义有所谓的“建设性使命”，为中国资本主义创造了物质前提，但这也使中国人民付出了极大牺牲和痛苦的代价，使中华民族遭受了“流血与污秽”，蒙受了“苦难与屈辱”。帝国主义的侵略正是近代中国落后贫困的根源，也是中国实现独立、民主、富强和现代化的最大障碍。资本－帝国主义为了其自身利益，在把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传入中国的同时，又有意保留中国的封建生产关系，扶植中国封建势力，阻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使中国走上半殖民地经济畸形发展的道路。更重要的是中国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物质文明所产生的成果和利益，绝大多数中国人民是享受不到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因为这“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因此，中国人民必须首先通过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争取独立和民主，否则是不可能真正实现中国的富强和现代化的。

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的那样：“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帝国主义靠侵略、掠夺、奴役中国人民获得了它们想要的一切。殖民者既不会给殖民地的人民群众带来自由，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殖民地的人民要根本改变自己的地位，必须完全摆脱殖民者的枷锁。资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对中国现代化的发生来讲，提供的只是“物质前提”，只是起到了“刺激作用”。

**2、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

随着中国的大门被西方列强用武力强迫打开，中国的社会性质开始发生质的变化。那么，究竟中国是半殖民半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一直是近代思想史上的一个争议。远自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近至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五年来，伴随着社会上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重新抬头，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问题又被提起。当下，历史虚无主义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告别革命”论，并由此而否定中国近代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否定中国近现社会发展的革命主线，否认20世纪中国发生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必要性。因此，中国社会性质的问题关系到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与发展前途等问题，关系到是取消革命还是继续革命的问题，是历史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的斗争。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究竟是什么？

（1）从历史的发展来看，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开始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国从一个享有完整主权的独立国家，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国家，从一个封建的国家逐步变成了半封建的国家，走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畸形发展的道路。中国社会之所以逐步演变成为一个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其决定因素是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相互勾结，并逐步发展的结果。

第一，太平天国起义期间，外国侵略者面对清政府和太平天国两个对手。1853年和1854年英国公使文翰、法国公使布尔布隆、美国公使麦莲先后访问天京，试探太平天国的对外态度，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要太平天国承认清政府与英、法、美三国已签订的条约“是极不可能的”，从而断言太平天国所代表的造反的农民是他们在中国的“真正敌人”。比较之下，外国侵略者不再把清政府看成是他们向中国进行侵略活动的主要障碍，相反，他们认为，只要能迫使清政府在条约上签字，保存和利用清政府来镇压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是对他们有利的。但是，他们在放弃“中立”的伪装，站到清政府一边以前，还要狠狠地先把它“揍一顿”，于是就有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发动。

清政府面对太平天国和外国侵略者两个对手。太平天国要推翻清政府的封建专制统治，取而代之。相反，对于外国侵略者，经过两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得出了这样的认识：这些外国侵略者“并不利我土地人民”，他们所要求的“仅仅”是那样一些条约，“并不是要到中国来做皇帝”，并且表示愿意帮助清政府“攻剿发逆”，经过比较，清政府认为，太平天国乃“心腹之害也”，外国侵略势力不过是“肘腋之忧”和“肢体之患”。就这样，太平天国成了中外反动势力共同的敌人。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以共同镇压太平天国为标志，中外反动势力开始勾结起来，半殖民地政治关系的新格局初见端倪。

第二，从1864年到1894年的30年，是中外反动势力既相互勾结又相互矛盾的3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以后，以共同镇压义和团运动为标志，中外反动势力完全勾结起来。

甲午战后，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被分割的危机达到顶点，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以后，联军统帅瓦德西就认为：以中国“武备之虚弱、财源之衰竭、政治之纷乱而论”实为实行瓜分的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然而，义和团“灭洋”运动的教训，又使瓦德西“恐怖地看到中国社会的底层蕴藏着如此巨大的反抗力量”，承认拳民运动之败，“只是由于武器不良之故”。根据这一观察，瓦德西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无论欧美日本各国”，均无力量能够单独统治占世界人口1/4的中国，瓜分之举“实为下策”。英国政府也认识到：“中国此后仍须以华人治华地”，“不能以对待印度的办法对待中国”，“团匪之事即可取以为鉴”。法国政府也认为：中国“民气坚劲”，“谁敢谓亚洲堂堂大国，无华盛顿其人起者”。俄国政府声明：对华政策以“协助”清政府“维持其国内秩序为前提”。在这样一个共识的基础上，帝国主义各国最后确立了“以华制华”的总方针和“保全主义”的总政策，即在形式上保持中国的“独立”以及“领土完整”，扶持一个对外软弱无能，对内有力量“维持秩序”的政府，使之成为它们间接统治中国的工具。为此，他们被迫放弃了瓜分中国的计划，继续采取支持清政府充当代理人的政策。粉碎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图谋，使中国避免进一步沦为帝国主义列强分割统治的殖民地。

与此同时，清政府在甲午战后，再也经不起来自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军事进攻，或者类似太平天国革命那样的沉重打击。义和团群众拥入京津，传授拳术，设立拳厂，焚教堂，杀洋人，京津沿线的义和团民或破坏铁路，或割断电线。清政府在失去控制局势的能力的情况下，为了躲避义和团的锋芒，决心利用义和团向各国宣战，然后再依靠外国侵略者的力量消灭义和团。于是，京城里的义和团民被引去攻打使馆和教堂，并得到了两万担粮食和十万两银子的赏赐。而当西太后率光绪帝及一部分大臣逃出北京，进入山西境内，摆脱了义和团的威胁之后，即发布剿匪上谕，对义和团转而采取镇压政策，指责义和团为“肇祸之由”，下令“痛加剿除”。同时，电令各驻外使臣向各国政府声明“朝廷非不欲将此种乱民下令痛剿，而肘腋之间，操之太蹙，深恐各使保护不及，激成大祸”，表示“中国即不自量，亦何至与各国同时开衅”，请求各国予以“谅解”。西太后既然表示“悔过”，经过商定，列强开列的必须惩办(处以死刑)的支持义和团的清政府高官11人名单中不仅没有西太后的名字，而且仍然承认以西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在中国的统治地位及其派出的议和大臣——奕劻和李鸿章为合法。当李鸿章从北京寄送的“议和大纲十二条”到达西安后，西太后“喜过望”，随即诏告奕劻、李鸿章“尽如约”。并于1901年2月，发布一道上谕，通告天下臣民，今后它的对外态度是：“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对于向各国宣战一事，竟然表示“事后追思,惭愤交集”。从此，清政府彻底地走上了以对外投降来维持其对内统治的道路，成了“洋人的朝廷”。

至此，在资本－帝国主义侵入中国60年以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政治关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互相结合共同压迫中国人民的新格局最后确定下来，这一半殖民地政治关系新格局的最后确定，就成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最终形成的标志。

（2）正确认识革命的基本问题

认清社会性质,“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才能正确认识革命的基本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进行了较长期的艰辛探索，才得出了符合中国社会实际的正确认识和科学判断。

第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预见和论述。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马克思恩格斯站在唯物史观的高度，科学地预见了中国社会演化的趋势，指出中国社会将发生深刻的根本性的变化。1912年列宁在《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中，使用了“中国这个落后的、农业的、半封建国家”的定性词语。1916年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文章中，又把中国列入半殖民地。1922年初，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接受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在7月党的二大上，明确制定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和动力问题，完成了建党的任务，为继续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奠定了基础。

第二，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人的主张和认识。国民革命失败后，认清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社会性质，成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复兴中国革命的一个首要问题。当时有人认为中国社会是封建社会，有人认为是资本主义社会，有人认为是前资本主义社会，也有人认为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28年6、7月间召开的中共六大认为，中国的社会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929年2月，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完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概念。但陈独秀等人否认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认为中国社会已经是资本主义占优势并将得到和平发展的社会，认为国民党政权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权。在这种复杂的历史时期，正确认识中国的社会性质十分必要。192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指出，中国红色政权的发生“必然是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毛泽东认为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的性质依然是半殖民地社会，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1930年1月,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文章中，针对当时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估量和行动问题上的错误认识指出：“他们的这种理论的来源，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件事认清楚。”这一方面说明了国民革命失败后，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社会；另一方面则说明了认清中国社会性质的重要性。正因为党内一些同志没有认清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社会，对毛泽东领导的以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为开端的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红色政权的必要性认识不足，因而对红色政权和革命前途产生了怀疑和悲观情绪。因此，认清中国社会性质，对于领导中国革命至关重要。

1935年12月，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指出，“大家知道,差不多一百年以来，中国是好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半殖民地的国家。由于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和帝国主义国家相互间的斗争，中国还保存了一种半独立的地位。”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的形势下，毛泽东仍然认为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地社会，并以此说明了和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日条件下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系统解决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的政治路线问题。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我们现在是从事战争，我们的战争是革命战争，我们的革命战争是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度里进行的。”毛泽东在坚持对中国社会半殖民地性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系统说明了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问题。

抗日战争时期，随着中国革命的不断发展，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科学总结了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更为深刻。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指出：“由于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半封建经济占优势而又土地广大的国家，这就不但规定了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基本的革命的动力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而在一定的时期中，一定的程度上，还有民族资产阶级的参加，并且规定了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在此，毛泽东明确提出了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在对中国社会性质正确认识的基础上，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等问题作了科学的阐述。

同时，毛泽东还分析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特点及其主要矛盾。1940年1月，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又阐述了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指出：“自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中国社会又逐渐地生长了资本主义因素以来，中国已逐渐地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现在的中国，在日本占领区,是殖民地社会；在国民党统治区，基本上也还是一个半殖民地社会；而不论在日本占领区和国民党统治区，都是封建半封建制度占优势的社会。这就是现时中国社会的性质，这就是现时中国的国情。”毛泽东在此基础上论证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走，“很清楚的，中国现时社会的性质，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它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步骤。”从而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形成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美帝国主义代替日本帝国主义成为侵略中国的主要力量，它企图变中国为它的附庸，使中国社会进一步殖民地化。中国社会的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正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指导下，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有了完全正确的认识，解决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前途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中国共产党才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形成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从而指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

**课堂讨论：**

**问题：中国近现代的社会主题是什么？**

**评析：**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民族面临着两大历史任务，一方面必须革除外国帝国主义和勾结外国帝国主义的中国封建主义的命，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另一方面也要学习西方，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但是，在这两重任务中，革命不是为了革命，现代化也不是为了现代化，革命和现代化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最高目标，那就是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现代国家。换言之，建设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国家是中国近现代的社会主题，而革命与现代化则是完成这一社会主题的两大重要手段。

**3、近代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并建立起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在秦体制的基础上，汉朝最终创立了延续中国2000年封建社会的基本模式：以个体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思想文化体系，以高度中央集权为特征的君主专政。这些特质虽维系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稳定和延续，但却无法回避周期性的王朝危机。

（1）西方的进取之势

历史似乎可以永远按照“周期率”演进下去，而无需考虑其他因素。然而，公元1500年前后的地理大发现，情况开始发生变化。随着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先后驶向万顷波涛，东西之间的地理距离所造成的空间障碍比过去变得容易超越了，在这个过程中，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英国一个接一个开始在全球范围内谋求自己的兴盛发展之路。陆续东来的西方人先后占据了中国周围的国家，逐步接近中国，向中国窥视。

从《马可·波罗游记》问世起，西方人就憧憬、羡慕、向往着东方。16世纪，他们终于来到了这个地方，几百年梦一样的幻想实现了。中国这一古老的东方大国也因此而成为最大的猎取目标。

面对来自西方强劲的进取之势，中国的最后一个王朝却越来越走向保守防范。《乾隆御制诗》中曾有“间年外域有人来，宁可求全关不开”，表现出对西方人叩关的深深疑忌。清朝的皇帝们始终认为国家的命脉在农业，而不是商业和贸易。在他们的脑海中，天朝上国的中国，富有四海，其他国家不过是仰“中华帝国”鼻息的“蛮夷”之邦。因此，天朝不仅不屑与夷商接触，且又用一连串防范外夷条规，对西方商人作出严格苛细的限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种细密的防范曾有效地阻止了西人深入中国腹地，但这个过程也同样有效地使中国人对世界的了解日益模糊。即使中英两国因鸦片贸易而冲突日趋激烈之时，士大夫们依然以为只要“绝茶与大黄不使出”，就可使夷人屈服。[[2]](#footnote-2)在这种固步自封的氛围中，清朝的统治者全然没有意识到，被他们视作蛮荒岛夷的西方国家已挟海风而来，利刃已高悬头顶，前所未有的黑暗浩劫已开启。与此相伴，痛苦的劫难，也就此唤醒了沉浸于强大幻梦中的中华民族。

（2）民族意识的觉醒

一般说来，一个民族的觉醒首先表现为民族意识的觉醒。民族意识是维系民族生存、发展最基本的思想观念。在近代中国的百余年间，中华民族经历了四次民族意识觉醒的历程，即鸦片战争后先进中国人开始“开眼看世界”；中日甲午战争后民族意识的初步觉醒；五四运动期间民族觉醒意识的升华；抗日战争期间民族意识的全面高涨。

第一，鸦片战争后民族意识的萌发

鸦片战争中西方殖民者的隆隆炮声，在击灭了清王朝统治者“天朝大国”迷梦，给中国民众带来巨大灾难的同时，也为中国人推开了一扇观察与了解西方世界的门窗。一部分中国人透过弥漫的硝烟终于发觉自己面临的对手是完全陌生的，两千年来传统的夷狄观念在头脑中开始动摇。处于风云漩涡中心的林则徐便在时代波朝的鼓荡下成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链接·人物介绍：林则徐（1785～1850）[[3]](#footnote-3)**

福建侯官（今福州）人，嘉庆进士，1838年12月受命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前往广东禁烟，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237万余斤鸦片。1840年1月任两广总督。为了了解西方情况，派人翻译外文书报。主张仿制西方极利之炮、极坚之船，为制夷防夷之用。

在粤期间，为推动禁烟的深入发展与防备英国的武装侵略，林则徐开始主动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广泛搜求西洋情报，并组织翻译西文书报，所译资料先后辑有《四洲志》、《华事夷言》、《各国律例》等。在众多有关西洋情事的文献资料中，以《四洲志》最为重要，系据英人慕瑞著《世界地理大全》编译而成，刊行于1841年，简要叙述了世界五大洲30多个国家的地理、历史和政治状况，是近代中国第一部相对完整、比较系统的地界地理志书。该书不仅是一种历史资料，而且记录了中国民众最初借助文字而了解到的西方世界的形象和情态。

1841年秋，被道光帝遣戍伊犁的林则徐，在途中与魏源相见于镇江。两人追昔抚今，不禁百感交集。林则徐向魏源倾吐了“患无已时,且他国效尤”的远虑，并把在广州时搜集、翻译的外国资料和《四洲志》的手稿交给了魏源，嘱托他进一步搜集研究外国情况，编撰成书，以便国人了解“夷情”，制订抗敌御侮良策，魏源欣然答应。

**链接·人物介绍：魏源(1794～1857)[[4]](#footnote-4)**

湖南邵阳人，道光进士，曾受林则徐嘱托，据《四洲志》及中外文献资料编成《海国图志》，主张“恩夷长技以制夷”，强调学习西方制造战舰、火器的先进技术和选兵】练兵之法，来改革中国军队，以甲兵制甲兵。

魏源少有才名，但是科考不利。他有济世救国之志，一向关注社会现实。1841年，他进入两江总督裕谦的幕府，参与谋划对英作战，并在前线审讯俘虏，他由此获得了对英国的第一个直观感受。但面对进退失据的清政府、昏聩无能的高层官员，他一怒之下，愤而辞职回家，立志于著述。

遵照林则徐的嘱托，魏源以《四洲志》为基础，广搜中外著述，按区分国，增补整理，于1843年初编成《海国图志》50卷，四年后增补为60卷。1852年，又补充葡萄牙人玛吉士《地理备考》、美国人高理文《美理哥合省国志》等，扩展为100卷。书中全方位地介绍了世界各国的地理、历史、政治、经济、军事、科技，乃至宗教、文化、教育、风土等各种情况，不少造炮制船这样的近代军事科技资料，也汇聚书中。

魏源以前所未有的客观目光审视着当时的中国与世界，他不仅清晰地点出了中国的问题：“夷烟蔓宇内,货币漏海外，此前代之所无也”，更看到了整个世界大势：“岂天地气运，自西北而东南，将中外一家欤!” 他认识到地处东南的中国已不再是中心，远远落后于欧洲，而且世界正在逐步成为难以分割的整体，这是对世界市场日益扩大的直觉反应。

在中国传统文化环境中长大，对中华文化充满自豪的魏源直面中国的落后与西方的强势，开始反思“天朝大国”的迷梦。他看到了坚船利炮的力量，也隐约看到了近代化国家在制度上的长处。

在鸦片战争的整个过程中，严酷的事实暴露了中西间的差距，促使一批爱国知识分子在比较中思考。姚莹对鸦片战争的失败痛心疾首，悉心研究国外情况，写成《康輶纪行》，对中国边疆及英、俄等国的情况作了探讨。冯桂芬虽对列强侵略中国深恶痛绝，却敢于面对现实，承认中国落后于他人的严酷事实，并理智地认为，落后于人有“天赋人以不如”和“人自不如”之别，如果属于前者则无话可说，如果属于后者，才是真正的可耻。他没有因落后而望洋兴叹、无所作为，而是以落后为耻，树立起雪耻自强的信心。冯桂芬的“雪耻自强”思想集中反映了鸦片战争后国人“开眼看世界”、图强御侮的强烈要求。

第二，甲午战后民族意识的初步觉醒

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标志着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达到了一个新阶段。《马关条约》签订后，英、俄、德、法、美、日等列强争先恐后地掠夺在华权利，强租土地，划分“势力范围”，使中华民族陷入空前严重的危机之中。

经历过那场惨痛的革命老人吴玉章回忆说：“我还记得甲午战败的消息传到我家乡的时候．我和我的二哥曾经痛哭不止。……这真是空前未有的亡国条约！它使全中国都为之震动。从前我国还只是被西方大国打败过，现在竟被东方小国打败了，而且失败得那样惨。条约又订得那样苛，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啊！”梁启超则把这一震动视为中国人民族意识普遍觉醒的开端，他说：“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这种民族意识的普遍觉醒表现在民族危机意识的强化。

次年初，中日《马关条约》的签定引发了维新运动的兴起，救亡图存、挽救民族危机始终是这场运动的主旋律。严复在《马关条约》签订未久即撰《救亡决论》一文，呼出救亡的时代强音。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发动“公车上书”，痛陈中国所面临的民族危机之严重性，以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对国人进行救亡图存的思想启蒙。

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后，中国人民开展的救亡图存斗争非但没有停止，反而以更大的规模和气势磅礴发展，再一次走向新的高潮。标志性的事件是义和团运动和革命派发动的广州起义。前者打出“扶清灭洋”的旗帜，试图以“笼统排外”方式抵制列强侵略，挽救民族危机；后者则要用民主革命的手段推翻清朝统治，把中国引上革命建国的道路，重建民族国家。二者思路截然不同，但是他们的目的都是谋求民族的解放与独立。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国人的民族意识更为鲜明。无论是改良派，还是革命派，都以倡导民族主义为职志，发表了大量论述关于“民族主义”的文章。大致在2O世纪初，先进中国人初步摆脱了传统民族观念的狭隘性，吸收了西方近代民族理论、民族思想观点，形成了近代民族观念和民族主义思想。在关于民族主义的阐述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孙中山提出的民族主义。这是他三民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把民族主义作为进行反清斗争的一个重要纲领。

第三，五四运动时期民族觉醒意识的升华

辛亥革命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有增无已。1915年，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沙俄策动蒙古王公制造分裂活动；英国在西藏煽动“独立”，谋取更大的侵华利益；1918年巴黎和会再次暴露了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本质和军阀政府的卖国嘴脸。中国外交在巴黎和会的失败，成为五四运动爆发的导火索。为了抗议帝国主义列强利用巴黎和会对中国权益的侵害和北洋政府的卖国行径，爱国学生、民众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勇敢地走上街头游行示威，表达了中国人民坚决反帝爱国的正义之声。国人的民族意识由此得到了历史性的升华。正如一位外国人所说，五四运动“早已表现出了中国真正的、积极的民族特性”；从巴黎和会决议的祸害中，“产生了一种令人鼓舞的中国人民的民族觉醒，使他们为了共同的思想和共同的行动而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全国各阶层的人都受到了影响。”

五四运动在提升中国人民民族意识方面的作用，集中地体现在国人对于帝国主义列强本质的认识有了新的升华。正如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所说：“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也是这样。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认识阶段，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第二阶段才进到理性的认识阶段，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这种认识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的。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孙中山在五四运动前后的民族主义思想发生了重要变化。俄国十月革命及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提高了他对民族问题的认识，开始重提民族主义，恢复三民主义的本来精神。他在1919年所写的《三民主义》一文中说，中国的民族主义有“消极目的”和“积极目的”，推翻清朝只是达到了“消极目的”，而“积极目的”则是使整个中华民族“驾美迭欧而为世界之冠”，国人还要继续为之奋斗。在国民党“一大”《宣言》中，孙中山重新解释民族主义，把反帝国主义列入其中，这与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最低纲领基本一致，成为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政治基础，也是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中国出现反帝爱国斗争浪潮和争取民族独立运动高潮的重要政治条件。

第三，抗日战争期间民族意识的全面高涨

1937年7月7日，日军制造卢沟桥事变，发动了旨在灭亡中国的全面的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为了抗击日寇入侵，挽救空前严重的民族危亡，中国共产党出于民族大义，旗帜鲜明地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正如毛泽东所说：“将阶级利益服从于民族利益。国内任何政党与个人，都应明此大义。共产党人绝不将自己观点束缚于一阶级与一时的利益上面，而是十分热忱地关心全国全民族的利益。”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下，全体国民的民族意识空前高涨，所有爱国的人们都把拯救民族、保卫祖国和反抗日寇侵略，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伟大的抗日战争之中。正是源于强烈的民族意识而爆发出的爱国激情，成为支持中国持久抗战的巨大精神源泉。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发挥到最佳状态，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从未有如此强烈，尤如晏阳初所说：

几千年来，中国人所怀抱的观念是“天下”，是“家族”，近代西方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始终没有打入我们老百姓的骨髓里。直到现在，敌顽攻进来的巨炮和重弹，轰醒了我们的民族意识，南北数千里燃烧的战线，才激动了我们的全面抗御、同仇敌忾的精神。我们从亡国灭种的危机中，开始觉悟了中国民族的整个性和不可分性。生则同生，死则同死；存则同存，亡则同亡。这是民族自觉史的开端，是真正的新中国国家的序幕。[[5]](#footnote-5)

（三）小结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以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对中华民族发动了野蛮的侵略，给中华各族人民带来巨大的历史灾难。深重的民族危机深刻地教育了中国人民，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民族意识的日益强烈、民族自觉的不断升华，成为中华民族觉醒的重要标志。这种意识最终成为催生、助长近代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精神动力。凭借这种“热烈的民族意识，高扬的政治水准”，中华各族人民与各种外敌展开殊死斗争，粉碎了侵略者无数次灭亡中国的美梦，捍卫了祖国的独立和民族的尊严，书写了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

鸦片战争后，仁人志士痛感于列强之帝国主义如怒潮聚至，武力的掠夺与经济的压迫，使中国丧失独立，陷于半殖民半封建之地位，乃从革命和现代化两个方面发起了救亡图存和振兴中华之路。从晚清以至民国，各界先进份子前赴后继，为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现代国家而奋斗。但是，为什么大目标相同的各阶层政治势力，最终的结局却不尽相同，有的在历史上昙花一现便被历史抛弃，有的则在一度取得辉煌成绩，做出巨大历史贡献之后，迅速沉沦，走向历史潮流的对立，有的则历经挫折和磨难，最终由弱变强，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领导核心？要想获知答案，就让我们重温近代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奋斗历程吧。

三、教学建议

（一）学时建议

本专题可安排3-4学时。

（二）教学方法建议

1、课堂教学：讲授法、讨论法、案例教学法；

2、实践教学：体验式教学法、情景式教学法。

（三）阅读书（刊）建议

1、陈旭麓：《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上海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2、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杜1981年版。

3、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4、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三联书店1995年版。

5、周宁编著：《2000年西方看中国》，团结出版社1999年版。

**参考文献：**

1、王晓秋：《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6年第10期。

2、杨荣：《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几个认识问题》，《内蒙古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3、史革新：《略议近代中国民族意识的四次觉醒》，《高校理论战线》2009年第3期。

4、王宪明、蔡乐苏主编：《中国近现代史述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九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50、247、250页。 [↑](#footnote-ref-1)
2.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一），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第521页。 [↑](#footnote-ref-2)
3. 陈旭麓：《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上海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0页。 [↑](#footnote-ref-3)
4. 陈旭麓：《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上海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8业。 [↑](#footnote-ref-4)
5. 晏阳初：《农民抗战的发动》，《大公报》1937年10月11日。 [↑](#footnote-ref-5)